

陕甘宁边区史

雷云峰

编著

抗日战争时期（上）

西安地图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史

(抗日战争时期) (上)

西安地图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3 号

责任编辑 刘 戎

封面设计 史国霖

陕甘宁边区史

抗日战争时期 (上)

雷云峰 编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友谊东路 12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地矿局测绘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96 印张 20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80545—219—9/K · 211

定价：4.95 元

顾 问：齐 心 张 馨

上 编：雷云峰 编著

总 编：雷云峰

出版说明

编写《陕甘宁边区史》，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批准列入的全国重点课题。旨在总结经验，揭示规律，发扬传统，提供借鉴，发挥其“存史、资治、育人”的作用，为“两个文明”服务，促进“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史上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自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党和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成熟和发展，党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在这里逐步形成。中国革命由极端困难走向胜利，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中央在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开展了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减租减息等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指挥了解放战争并取得全国的胜利。总之，在这块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儿成为全中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受到中外人士敬仰，被誉为“抗日的灯塔，革命的圣地”。

所以毛泽东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江泽民 1989 年 9 月 9 日到 12 日视察延安时，反复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

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因此，党中央极为关注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与撰写工作。并曾多次下达文件，推动和指导此项工作，特别是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革命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而恰当的结论，要求我们“对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这就为撰写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史论根据。

承担这项任务的课题组，于1987年4月成立，雷云峰任课题组长，并报经了中国社科院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课题组在陕西省社科院院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于1990年5月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一书的阶段成果。同时由课题组长雷云峰设计编写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史大纲》（草案），经集体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全书为四卷。第一卷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上编）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下编），第四卷解放战争时期。全书设总编，各卷设主编，副主编。

撰写本书得到各方面的关怀与支持。大纲与书稿经过中央党史资料征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教授，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琪、张秀新、刘经宇，田为本研究员、中央党校王渔教授，黄少群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章学新、李海文等同志。原《陕甘宁边区简史》作者、原中央教育部长董纯才等同志，陕西师大陕甘宁边区研究室房成祥、黄兆安教授，西北大学陈舜卿教授北京钢铁学

院宋金寿教授等，提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法，客观地再现边区面貌，反映历史真实，使它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

在撰写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中央（1983）28号文件精神，先将这部分具体写作纲要，分别寄送给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在京的原陕甘边陕北两部分老同志审阅征询意见，书稿写出后再寄他们审阅修改定稿。

撰写抗日战争部分，我们聘请了齐心、张馨为顾问。

解放战争部分，我们聘请廖盖隆、田为本（原兼本卷顾问）杨荫东等，具体指导。在此对上述领导、教授、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5月

上 编

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 根 据 地

(1937年7月—1940年12月)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抗战的出发点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地位	(1)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 抗日战争的旗帜	(1)
二、国共两党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4)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8)
四、边区内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3)
五、边区的行政区划	(17)
六、中国共产党组织名称的更易与工作方式的 转变	(19)
七、中共洛川会议。八路军誓师关中、开赴抗日 前线	(21)
八、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延安成立	(27)
九、地方武装建设	(36)
第二节 结束双重政权，统一政令	(40)
第三节 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	(44)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44)

二、剿匪除奸、安定社会秩序，确保群众既得利益	(47)
第四节 保卫河防，警惕空袭，击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	(53)
一、敌我态势与双方战略战术	(53)
二、成立河防战斗司令部，千里河防，分段防守	(55)
三、保卫河防，击退日寇对边区的进攻	(56)
四、完备防空设施，预防日机轰炸	(65)
第二章 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是创造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中枢	(68)
一、中国共产党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陕甘宁特区委员会的成立	(68)
二、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69)
三、中共对陕甘宁边区领导方式的转变	(72)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	(75)
一、《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75)
二、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的开展	(77)
三、选举运动的经验教训	(80)
第三节 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与民主制度的确立	(81)
第四节 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87)
一、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与民族政策的制定	(87)
二、民族工作的开展	(90)
三、支持少数民族组建武装和文化团体	(93)
四、尊重与团结少数民族，满足其发扬优秀文化传	

统与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	(95)
五、贯彻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99)
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104)
第五节 建设廉洁奉公的抗日民主政府	(107)
一、法以护廉、逐步完善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	(107)
二、奉以养廉，避免官兵薪俸悬殊，缩小等级 差别	(109)
三、“勤能补拙，俭以育廉”，反对奢侈浪费	(110)
四、建立监督机制，抑制腐败现象滋生	(112)
第六节 边区高等法院的建立与法制建设	(112)
第七节 贯彻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积极开展外事 活动	(124)
一、中共中央的外交政策与边区党政所作的相应 规定	(124)
二、设立外事机构，做好接待工作	(127)
三、边区外事活动在国内外产生的政治效应	(131)
四、对抗日援华运动的有力推进	(135)
第三章 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经济	
第一节 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 财经工作方针的提出与实行	(142)
一、争取外援	(143)
二、休养民力	(145)
三、节约开支，保证供给	(152)
四、建立边区各级财政机构，统一与健全财政 制度	(152)
第二节 边区的财政支出状况	(154)
第三节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159)
第四节 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171)

一、公营工业的创建	(171)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179)
三、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恢复	(182)
四、食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84)
第五节 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186)
一、保护商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187)
二、公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188)
三、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190)
四、延安南区合作社	(192)
五、延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商业的发展	(193)
第六节 金融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195)
一、发行钞票	(198)
二、存款	(200)
三、汇兑	(201)
四、代理金库工作	(202)
五、自营商业	(204)
第四章 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206)
一、抗战以前陕甘宁边界地区新文教运动的回顾	(206)
二、抗战初期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210)
第二节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213)
一、群众文化团体的成立如雨后春笋	(213)
二、文学艺术繁荣昌盛	(214)
三、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	(217)
四、出版事业的蒸蒸日上	(217)
第三节 社会科学研究深入发展	(226)
一、哲学的深入与普及	(226)

二、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226)
三、新文字运动的推广	(227)
第四节 自然科学与医疗卫生新局面的开创	(229)
一、自然科学研究的良好开端	(229)
二、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	(232)
第五节 教育事业的普及突飞猛进	(234)
一、国民教育兴旺发达	(235)
二、干部教育成就卓著	(243)

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7月—1940年12月)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 抗战的出发点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地位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旗帜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灭亡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标志着全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中国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人民、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进行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中国内部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英美给予了蒋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中苏日益接近，便急于一举灭亡中国，以此来镇压国内的反战势力，

确立并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它同英美及苏联对抗的地位。从 1937 年 4 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断地向华北平津方面增兵，组成了强大的战略兵团，并在北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进行频繁的实战演习。6 月初，经过几度波折而成立的近卫文麿内阁，缓和了军部、政党、财阀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这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华一击论”的声浪占据了上风。他们以为侵华战争一旦发动，凭其强大军力，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动摇，妄图三个月^①就能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它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醒和无穷的力量。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进宛平县城内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本侵略军便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二十九军何基沣旅的吉星文团全体将士奋起抵抗。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抗日。卢沟桥事变成为全国抗战的起点。

抗战爆发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骤变。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立即大举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在日本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下，国民党政府仍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企图谋求对日妥协，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停止日本在华北的进攻。蒋介石说：“在和平根绝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时，蒋介石不允许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有

^①[日]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资料》第9卷，东京1964年版第17—18页上说：“日军参谋部制定的《在华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

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抗日活动。同时，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同日本谈判。当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新增援军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攻击时，虽有第二十九军的官兵同敌人英勇作战，但抵抗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英勇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乃奉蒋介石之命仓皇从北平撤退到保定。30日、31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接着大举向华北腹地进兵。

为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侵略者又把战火烧到上海。自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已在上海驻有军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又增兵上海，8月13日，突然炮击闸北一带。我上海驻军乃奋起还击。

上海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等国在华利益的集中地区。当上海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攻击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那种战和不定的态度才有所扭转，不得不作出新的决断。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即派73个师的兵力参加了上海的抗战。

中共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民族抗战。红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请缨杀敌；强调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组织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张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

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的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5日，延安各界又召开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延安的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运用各种宣传

手段，敦促国民党政府立即下定抗战的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

日军从平津沿交通线步步进逼，前线抗战失利时，国共谈判尚无明确的结果。为了早日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已进行了改编教育，并着手进行整编工作。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机会进行抗战动员。

8月1日，延安和边区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组成的各代表队及群众集聚在南门外体育场举行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在升旗仪式上，第一次将镰刀锤子旗和青天白日旗一同升起，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决心。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抗战动员讲话。号召同志们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准备到抗日最前线。朱德代表中国人民发出誓言：“我辈皆黄帝子孙，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部队中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红军作好了开赴前线的一切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就奔赴抗战前线，英勇杀敌。在边区内，中共各级组织都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人们高唱：“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的抗战歌曲，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二、国共两党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共中央为促进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从1937年2月到全国抗战爆发时，国共两党进行过三次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接着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主张；并声明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它的基本内容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一致的。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在 1927 年反共以后，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如果国民党彻底改变这种立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能够成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在庐山又一次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的内容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快发动全国抗战。但这时蒋介石对抗日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他仍公开说：“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同时又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谈判无结果。7月18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庆龄转交蒋介石，内容有：应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佑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边区范围包括现在所辖 18 县（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富县、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定边、淳化、旬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因此谈判没有结果。

7月27日，周恩来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蒋说：“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周说：“这没问题，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9日，周恩来、朱德、